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0034671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瑞士)西斯蒙第 著





2 018 6684 6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或
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

〔瑞士〕西斯蒙第 著

何 钦 译



商务印书馆

1983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

或

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

〔瑞士〕西斯蒙第著 何钦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4017·84

1964年3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3年5月北京第4次印刷 字数 374千

印数 10,500 册 印张 17 5/8 插页 4

(60克纸本)定价：1.95元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river.com/shop.php?id=3665>



606126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今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现在刊行五十种，今后打算逐年陆续汇印，经过若干年后当能显出系统性来。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1年1月

評西斯蒙第的《政治 經濟学新原理》

林森木

(一)

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西斯蒙第(1773—1842)是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又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出生于瑞士的法语居民居住区，属于法国学者的行列。在经济学说史上，西斯蒙第处于特殊的地位；他是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出版于1819年，这本书是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西斯蒙第恰好生活在大机器工业在欧洲大陆刚刚开始发展的时期。这个时代的特征是欧洲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地得到发展，这种发展在法国大革命消灭了封建残余以后表现得特别明显。尽管封建统治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竭尽全力企图阻止这种发展；但是，即使是在欧洲出现政治反动的局面下，资本主义仍然在胜利地前进。在欧洲各国中，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洪流不断地冲击着封建主义制度的基础。

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胜利，也就是大生产对小生产的胜利。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摧毁着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也瓦解着和排

挤着小商品生产；資产阶级的胜利不仅推翻了封建貴族，也使中世纪的小市民和小农处在动荡和不断破产的境况之中。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形成了、并且作为資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而經常重新形成着新的小商品生产者，即小資产阶级。但是，竞争經常把这一阶级的成員扔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只有其中的少数人发了財上升到大資产阶级的地位。因此，小生产者开始觉察到，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們很快会完全失去他們作为資产阶级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业和农业中他們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員所代替。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必然会出现反映小資产阶级利益和願望的理論家。西斯蒙第就是这方面的头面人物和典型表述者，他的《政治經濟學新原理》系統地論证了小資产阶级的利益和願望。

小資产阶级是过渡性的阶级，处在資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間。小資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种地位，使得它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劳动者，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它貧困和破产，因而倾向于无产阶级；另一方面是私有者，倾向于資产阶级。西斯蒙第的《新原理》充分地反映出小資产阶级的中間地位和两面性。

《新原理》的作者在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观点上深受資产阶级经济学家亞当·斯密的影响。和斯密以来的一切古典经济学家一样，西斯蒙第在价值学說方面承认商品的交换价值由生产商品时所耗費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原理；在关于剩余价值的問題上，把利潤和地租看为是工人劳动产品的扣除，是額外价值；在对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的分析方面，接受“斯密的教条”，认为年产品的价值只分解为收入，抛棄了不变資本部分。但西斯蒙第处于当时的主要思

潮之外，热烈拥护小生产，反对资本主义大企业经济及其维护者。

在《新原理》中，西斯蒙第否认自由竞争具有无限优越性的说法，指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否认资本主义矛盾和把资本主义说成是合理的自然制度，并具体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马克思指出：“如果说在李嘉图那里，政治经济学无情地作出了自己的最后结论并以此结束，那末，西斯蒙第则表现了政治经济学对自身的怀疑，从而对这个结束作了补充。”^① 这就是说，李嘉图虽然意识到工资与利润对立、利润与地租对立，但他认为这是自然的现象；而西斯蒙第则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的问题。

西斯蒙第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矛盾。他感觉到资本主义生产是自相矛盾的，它一方面刺激生产力和财富的自由发展，另一方面又限制着这种发展。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间的矛盾，商品和货币间的矛盾，买和卖的矛盾，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矛盾等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些矛盾也将发展。他还觉察到这样一种根本性的矛盾：一方面是生产力和财富的无限发展，另一方面劳动群众只能获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因此，在他看来，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必然会发生，它是资本主义矛盾的必然结果。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方面把绝对意义上的劳动（因为在他们看来，雇佣劳动和劳动是等同的），另一方面又把同样绝对意义上的资本，把工人的贫困和不劳动者的财富同时说成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他们不断地在绝对的矛盾中运动而毫不觉察。（西斯蒙第）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1页。

由于觉察到了这种矛盾而在政治经济学上开辟了一个时代。)”^①

西斯蒙第为了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毫不犹豫地指责资本主义的发展，抨击“后果严重的竞争”。但是，对于这一切，他总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来衡量。他用独立的小生产，即农村中的农民自然经济和城市中的手工业，来反对资本主义；斥责资本主义破坏了小生产者的有保障的生活，妨碍了他们之间互相接近，即手工业者接近消费者，农民接近和他平等的农民；颂扬小生产保证了生产者的独立性和没有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

西斯蒙第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但他不了解资本主义矛盾，没有试图去分析资本主义矛盾的起源、发展和趋势，他把它们看为是反常的或错误的偏向，看为是学说和政策、措施等等的矛盾或错误。同时，他也不了解资本主义矛盾的解决过程。他反对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希望用别种办法来消除资本主义的矛盾。他希望依照资本的比例来调节收入，或依照生产的比例来调节分配，以此来消除矛盾。他想恢复生产的正确比例（这是一种为小生产所特有的“正确比例”），又要保存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因此企图把中世纪的行会和宗法制的原则和思想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里来。

西斯蒙第反对资本主义大生产，而把独立的小生产看为是自然制度。他不懂得资本主义大生产和独立的小生产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懂得这是商品生产的两种形式。他反对资本主义大生产，也就是反对商品经济的最发达的形式，而把小生产捧上了天，也就是把商品经济的萌芽形式捧上了天。他不了解他所偏爱的农民小生产者和手工业者实际上已经成为小资产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三册，第285页。

典作家们正是根据这一点，评定西斯蒙第是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家，指出他的观点是“反动的”。

说西斯蒙第的观点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决不是说西斯蒙第维护落后的小资产者，同情小店主的自私自利的心理或阻止社会发展、向后倒退的愿望。西斯蒙第在任何地方都沒有维护他们，他想站在一般劳动阶级的立场，他表示自己同情这些阶级的代表，例如他因工厂立法而感到高兴，他攻击资本主义并指出它的矛盾。这些术语只是说明西斯蒙第的观点是错误的，他的理解和眼光是狭隘的，因而他所选择的达到一个十分美好的目的的手段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它只能满足小生产者或为复古主义者服务。

马克思在说明把不同作家的理论归结为不同阶级的利益和观点时指出：“不应该狭隘地认为，似乎小资产阶级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就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①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52页。

(二)

西斯蒙第开始从事經濟学著述活动时，是英国古典經濟学家亞当·斯密的信徒。他在 1803 年出版的《論商业財富》一书中，介紹和闡述了斯密的代表作《国民財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基本观点。但在写作《新原理》一书时，西斯蒙第已經成为英国古典政治經濟学的反对者了。对于这种变化，他自己是这样认识的：“自从我写了《論商业財富》以后，已經十五星霜，在这期间，我很少閱讀政治經濟学著作；但我并没有停止观察事实。有些事实我觉得与我所采取的原理大相徑庭。但是，当我把自己的原理向前推进一步的时候，我就能区别和分析这些事实了，一切都迎刃而解。我越往深处钻研，就越相信我对于亞当·斯密的學說所作的修正必要和正确的。”（第一版序）

西斯蒙第这种变化的根源当然不是由于对事实的观察，和他同时代的英国古典經濟学家大卫·李嘉图也对事实作了观察，但从同一事实所得出的結論却各不相同，甚至互相对立。問題的关键在于：他們两人的阶级立場不同，所持的观点不同。李嘉图和斯密一样站在資产阶级的立場，认为資本主义是自然制度，把工人阶级的存在看做一种不言而喻的事实。他发展了斯密的理論，完成了資产阶级古典政治經濟学。西斯蒙第則和他們不同，他站在小資产阶级的立場，认为小生产是自然制度，強調小生产者的破产过程，即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因此，他“修正”了斯密的理論，創立了政治經濟学中的小資产阶级流派。

西斯蒙第之所以把自认为是有独特見解的政治經濟学著作称

之為《新原理》，就是為了表示他在這一著作中所創立的原理是和當時流行的見解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學說的“修正”，特別是反对李嘉圖的經濟學原理。在西斯蒙第的新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中，關於資本同收入和人口之間的關係的學說是最突出的特點，因此他用“論財富同人口的關係”作為《新原理》的副標題。

西斯蒙第指出：斯密只是考察財富，并認為擁有財富的人總是关心財富的增加的，只有讓個人在社會上自由地進行利己主義的活動，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財富，因此政府對經濟生活應該聽其自然。正是在這兩個問題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學說。他認為，財富應該保證人們過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經濟學不應該只考察財富，而應該考察財富和人的關係，特別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夠增加自己的財富，甚至掠奪應該屬於窮人的財富；為了使財富的分配合理和均衡，保證窮人過幸福的生活，他說：“我們几乎始終呼籲亞當·斯密所擯棄的政府干預。”（本書第46頁）

在西斯蒙第看來，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人民物質福利的科學，它應該給政府提供管理全國財富的真正方法。他指責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把政治經濟學看為是研究財富的科學，而忘記了人，特別指責李嘉圖的學說；因為按照他的說法，在李嘉圖那裡，“財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本書第457頁）

西斯蒙第斷言，財富只是人類物質享受的象徵，它只是一種手段；人類進行財富生產是为了滿足自身物質生活的需要，不斷地提高物質享受。因此，財富應該給所有的人帶來幸福，而且也只有全體居民的物質享受增加了，國民財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經濟學的真正對象應該是人，而不是財富，政府應該通過政治經濟

使全体居民都能获得物质上的享受。

从这种見解出发，西斯蒙第給政治經濟學的对象下了一个定义：“从政府的事业来看，人們的物质福利是政治經濟學的对象。”（本书第 22 頁）这个定义表明了西斯蒙第把社会經濟发展过程看作是由国家調整和指导的过程，把政治經濟學和国家的政策混为一談。他在《新原理》中不是、或者說主要的不是說明社会經濟生活的內在联系是什么样的，而是孜孜不倦地告訴人們社会經濟生活應該什么样和不應該什么样，政府應該实行什么样的政策和措施干預經濟生活，以保证居民的物质福利。这样一来，政治經濟學就不是一門研究經濟現象的內在因果关系的科学，而是研究人們从事經濟活动和政府干預經濟生活所應該遵循的准則。

西斯蒙第強調政治經濟學應該研究人，應該研究人的需要。他把人的需要作为經濟生活應該遵循的准則，同时責难李嘉图忽視人的需要，不注意消費，过于沉迷于抽象，把政治經濟學变成了一門思維推論的空論；說“他們常常为了抽象的理論而牺牲了人和現實利益”（本书第 527—528 頁）。西斯蒙第证明人的需要的存在，这使他比狹隘的資产阶级經濟学家高明得多。但是，他所說的人不是在一定生产关系条件下的人，不是阶级，而是抽象的人。这种人只存在于西斯蒙第的想像里，是被他美化了的小資产者。西斯蒙第正是依据这种人的需要，把它看成是正常的自然的东西，是应当存在的东西，并要求現實經濟生活符合于它。

因此，西斯蒙第不去科学地分析資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規律，而是用小生产者的需要和願望作为評述社会生活的准則，只是訴諸道德和感情。按照他的說法，政治經濟學不是單純計算的科学，而

是倫理道德的科学，只有注意到人們的情感、需要和熱望时，它才能达到目的。他写道：“一般說来，亞当·斯密对待科学的态度是有些过分拘泥于計算数字，然而从全面来看，科学既属于感性又属于想像，感性和像是不需要什么数字的。”（本书第 46 頁注^①）又說：“我认为必須反对一般的、往往是輕率的、往往是錯誤的評判社会科学著作的方法。社会科学所要解决的問題比各种自然科学問題复杂得多；同时，这种問題需要良心正如需要理智一样。”（本书第 13 頁）其实，他在一切重要問題上，小資产者的“良心”总是战胜经济学家的“理智”的。

西斯蒙第指責李嘉图的方法过于抽象，但他自己的研究方法不仅和李嘉图一样也是过分抽象，缺乏历史观点，而且具有明显的主观唯心主义。他指責李嘉图迷恋于抽象的議論，其实是指責他的客观主义，即指責他从现实生活出发而不顧人們的主观願望。

西斯蒙第从人（小資产者）的主观願望出发，把过时的东西当作自己学說的标本。作为他的研究对象的人首先是消費的实体，这种人只是按照自己的需要来进行生产，因此生产是有限的，它要由消費来决定。生产、收入、人口以及消費之間都有一定的比例，它們的增长必須成相等的比例。这样一种为小生产所特有的“正确比例”，正是《新原理》的立足点。

在这里，西斯蒙第突出了人的需要，即消費，要求生产去适应消費。他把消費提到了首要地位，而不是把生产提到首要地位。所以，他反对李嘉图的为生产而生产的思想，强调生产是为了消費，指責李嘉图的見解是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如果說李嘉图首先是一位生产经济学家，那末西斯蒙第首先是一位消費经济学家，他以

消費占优先地位的思想作为基本原則来闡述政治經濟學。

西斯蒙第在談到自己写作《新原理》的基本思想时，这样說道：“我要闡明的是：財富既然是人的一切物质享受的标志，我們就應該使它給所有的人帶來幸福；我們必須使財富的增长跟人口的增加相互一致；在这些人口之間进行財富分配时必須按照这样一个比例，即如果沒有特大的天災人禍，他們不会为生活所苦。我认为，为了謀求所有人的幸福，收入必須和資本一同增长，人口不得超過他們賴以生活的收入，消費必須和人口一同增长，而再生产同进行再生产的資本之間以及同消費它的人口之間都必須成相等的比例。同时，我要指出……每当这个或那个比例关系遭到破坏时，社会便陷入浩劫之中。”这 本 书“就 是根据这种比例关系写成的”。（第二版序）

所以，《新原理》的任务无非是描述西斯蒙第向往的理想世界，对照一下現存社会是否和它一致，指責資本主义制度怎样破坏了各种应有的比例关系，呼吁政府調節經濟生活以保护居民擺脫競爭的后果。尽管西斯蒙第也曾主張政治經濟學應該建立在实际經驗、历史和觀察的基础上，实际上他只是把他的理想世界和現存社会相对立，迴避了对現存社会进行科学的分析，以小資产阶级的道德規範和說教来款待《新原理》的讀者。他給政治經濟學带来了小資产阶级局限性和浪漫主义。

（三）

从西斯蒙第把《政治經濟學新原理》一书又叫做《論財富同人口的关系》，就可以看到这本著作要說明生产和消費間的关系。他

認為在商品交換的社會里，生產需要資本，消費則需要收入去購買生產品。因此，在他看來，為了說明生產和消費間的關係，必須說明資本和收入間的關係。

西斯蒙第嘗試闡明資本和收入間的關係，把自己對這種關係的解釋作為《新原理》一書的特徵。他聲稱資本和收入間的區別對於社會是極重要的，把它們混淆起來是錯誤的，而要區分社會資本和社會收入又是十分困難的。他有保留地說：這就“接觸到政治經濟學中最抽象和最困難的問題了。在我們的概念中，資本和收入的本性往往錯綜在一起。我們看到，對於一個人是收入，對於另一个人則是資本，同樣一個東西一轉手就具有不同的名稱”（本書第 63 頁），就是說，時而稱為“資本”，時而稱為“收入”。西斯蒙第所說的困難實際上是這樣的：對個別企業主來說收入是他用來購買消費品的利潤（不用于積累的那一部分利潤），對於個別工人來說收入就是他的工資，然而社會收入並不是這兩種收入簡單的總和。因為那些生產機器之類的企業主和工人的產品不能當作消費品，只能用作資本；這些產品對其生產者來說是收入（補償利潤和工資），對其購買者來說則成了資本。

西斯蒙第雖然想從社會角度區分資本和收入，但他的思路十分混亂，對於困難感到一籌莫展。他僅僅指出了困難，當他一接觸到問題的所在，就迴避了困難。在有些地方，他曾接受斯密的說法，斷言從社會角度看資本是生產資料，收入是消費品；但他和斯密一樣，並沒有把這種見解貫徹始終。因此，西斯蒙第企圖從社會角度區分資本和收入的嘗試是失敗的，對於說明社會資本和社會收入間的關係沒有做出貢獻。

和許多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後繼者一樣，西斯蒙第也接受了亞當·斯密的錯誤見解，認為社會年生產品的全部價值只分解為工資、利潤（其實就是利潤和地租）。他寫道：“總之，國民收入和年生產是相等的，是等量。全部年生產在一年中消費掉，其中一部分由工人消費，他們以自己的勞動來交換，從而把勞動變成資本，並且再生產勞動；另一部分由資本家消費，他們以自己的收入來交換，從而把收入消耗掉。”（本書第 75 頁）他完全忽視了這個問題：既然生產需要資本（確切地說是需要生產資料），那末年生產怎麼能够以收入形式被工人和資本家全部消費掉？他拋棄了生產資料（不變資本）的部分，也就使自己無法正確地了解資本主義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不過，他企圖把社會年產品的價值分解為收入的見解，和社會收入與國內市場的學說、和資本主義社會產品的實現問題聯繫在一起，指出了資本主義條件下經濟危機的必然性。

西斯蒙第從社會年產品的價值僅僅分解為收入的見解出發，得出結論說：生產應該適應消費，生產應該由收入來決定，生產只要不再獲得收入就會停止。他說：“收入是從再生產中來的；但生產本身還不是收入，因為生產只有在實現之後，只有在每一件產品找到需要它或享受它的消費者……之後，才能獲得這一名稱，才能具有這種性質。”（本書第 84 頁）由於西斯蒙第把收入與生產（即所生產的一切東西）看為是一樣的，也就把實現與個人消費看為是一樣的。在他看來，資本主義社會的全部商品僅僅是以收入來購買，今年生產出來的商品是以上一年的收入來購買的，因此今年的生產要由上一年的收入來決定。至於積累（把收入轉化為資本）或擴大再生產，他認為只能逐步地實現。“假如生產逐漸增長，每年的

替換就只能使人們每年遭受一些輕微的損失，同时却能为将来改善条件。假如这种損失很輕微而又分担合适，每个人都会毫无怨言地承担这种損失。”（本书第 84 頁）

西斯蒙第一再強調生产必須适应消費，并把矛头指向自己的論敌李嘉图，指責他一味鼓吹无限制地发展生产，想給国家开辟致富之路，結果却把国家推向破产。

在《新原理》中，西斯蒙第闡述的主要学說是随着生产的增长，收入按比例减少。他把这个主要学說建立在使用价值和交換价值的对立上，认为由劳动時間构成的价值是資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根源。

西斯蒙第接受了英國古典經濟学家的見解，承认商品的交換价值必須由生产商品时所耗費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原理。他进一步指出，并不是一切劳动耗費都是創造交換价值，都能增加財富的；只有为社会所必要的劳动耗費，只有在增加必要劳动的条件下，才能生产交換价值，才能增加財富。他把必要劳动归結为全社会的需要和滿足这种需要的劳动之間的比例；換句話說，他所說的必要劳动不是由一定社会在一定時間內所有的平均劳动强度和平均劳动生产率来决定，而是要由滿足社会需要所必要的劳动量来决定。

西斯蒙第的这种見解，一方面強調生产商品所耗費的劳动必須是得到社会承认的，必須是社会所需要的，从而正确地指出了創造价值的劳动的特殊社会性质，并把价值量归結为必要劳动时间。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学批判》一书中，曾肯定西斯蒙第的上述看法是对劳动价值論的貢献。另一方面，西斯蒙第把需求和劳动間的

比例看為是基本的比例關係，斷言每個人一生到世界上就帶來各種需要，正是種種需要驅使人們進行生產，因此生產應該滿足需要，價值規律應該保證消費者滿足與他的勞動耗費相適應的要求。這就是說，供給必須適應需求，生產必須緊跟着消費，消費先于生產並支配生產。

事與願違，現實生活恰好與西斯蒙第的願望正相反。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大工業不能等待需求的狀況與之相適應，不得不經常以愈來愈大的規模進行生產，生產走在需求的前面，供給強制需求。資本家為了獲取利潤，不斷地擴大生產，採用新的技術和新的生產方法，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商品的價值。從而，只要能在一小時內生產出過去需要兩小時才能生產的東西，就會使市場上所有這一類的生產品的價格下降。競爭迫使生產者出賣花兩小時生產的產品時不能貴於花一小時所生產的產品。由此，競爭實現了產品的交換價值由生產它的必要勞動時間來確定的規律；同時，勞動時間成為交換價值尺度這一情況，因而也就成為勞動力的價值和價格下降的規律。這就是說，競爭迫使資本家壓低生產費用，減少工資支出，同時也使利潤率下降。

西斯蒙第指出，商業的擴展總是以縮減工資、利潤（包括利息）為基礎的。他舉例說：一個企業主擁有十萬法郎的流動資本，每年增殖的利潤是一萬五千法郎，其中六千法郎是利息，九千法郎是企業利潤。這位企業主雇用了一百個工人，他們的工資是三萬法郎。現在如果他的投資增加了，生產擴大了；資本從十萬法郎增加到四十萬法郎，其中二十萬法郎為固定資產，二十萬法郎為流動資本。利息等於一萬六千法郎，利潤則為三萬二千法郎，因為利息率已

从 6% 下降到 4%。工人人数将增加一倍，每个工人的工資則由三百法郎下降为二百法郎，总共为四万法郎。由此可見，生产增加了三倍，而收入則連一倍也沒有增加到（起初为四万五千法郎，現在則为八万八千法郎）。

毫无疑问，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收入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减少，这是事实。西斯蒙第感觉到这种矛盾，指出工資和利潤率的下降趋势是资本主义的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必然后果，明确地指出問題完全不在于机器的使用，因为机器本来可以給人类带来好处，問題在于不合理的社会組織。他写道：“真正的灾难决不是由于机器的改进，而是由于我們对机器的产品所进行的不公平的分配。我們越能够用有限的劳动生产出更多的制品，也就越應該增加我們的享受或休息”；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机器提高了工人的生产能力，强迫工人拿同样的工資，可是每日的劳动時間不仅沒有縮短，反而更长了，这是当前的奴役工人的社会組織造成的。”（本书第 450 頁注^①）

西斯蒙第駁斥了那种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被机器排挤以后能够得到补偿和使用机器对工人有利的错误論調，坚持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进步和財富增长往往使工人遭到損失的見解。他正确地认为，虽然采用机器会使产品的价格下降，但是对于丧失了一部分收入的工人來說，产品的降价如同画餅充饥，无补于事。

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与消費是矛盾的，这种矛盾就在于：在財富增长的同时，人民的貧困也在增长，社会生产力增长了，人民的消費却沒有相应地增长。这正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着一种为生产而生产的傾向；资本的一般生产规律是，

“按照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也就是按照用一定量资本剥削最大量劳动的可能性)进行生产,而不考虑市场的现有界限或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的现有界限。而这是通过再生产和积累的不断扩大,因而也通过收入不断再转化为资本来进行的,另一方面,广大生产者的需求却被限制在需要的平均水平,而且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必须限制在需要的平均水平。”^①

按照西斯蒙第的见解,商品仅以收入来购买,而收入则随着生产的增长而减少,从而破坏了他所设想的生产与收入间应有的比例,破坏了他所要求的生产与消费间应有的比例。他断言分配上的不平等,使国内市场缩小,正是生产与消费间比例的破坏,使得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危机的爆发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因为不顾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盲目地发展生产,必然使产品找不到销路,造成生产过剩。“由此可见,由于财产集中到少数私有者手中,国内市场就必定要日益缩小,工业就必定日益需要寻求国外市场,因而该国的工业就要受到更加巨大的波动的威胁。”(本书第217—218页)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虽能从国外市场实现其产品,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整个世界将形成为一个市场,再也不能找到新的购买者。

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过剩危机的必然性是西斯蒙第的巨大功绩。但他认为危机的根源是在生产条件之外,是由于消费不足。他把人民群众和工人的消费不足提到首要地位,以此作为危机的根源。这是经济学上用消费不足来说明危机理论的典型。

正确地评价西斯蒙第关于经济危机的学说,首先必须强调指出他阐述危机问题的基本原理是完全错误的。他和资产阶级经济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三册,第610—611页。

学家李嘉图和萨伊一样，错误地认为社会年产品的价值仅仅分解为收入，抛弃了不变资本部分，不了解为生产消费领域服务的市场对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意义。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点是不仅不变资本的绝对量不断增长，而且不变资本的相对量也是不断提高的。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对不变资本的要素即生产资料的需求，要比对可变资本的要素即消费资料的需求增长得更快。西斯蒙第认为年产品等于收入，把实现和个人消费混为一谈，造成自己对资本主义市场的错误观念，看不见日益增长的生产资料市场。他不了解随着小生产的破产，国内市场反而会扩大，因为国内市场的扩大既靠个人消费品市场的扩大，更靠生产资料市场的扩大。他企图用国外市场来解决资本主义的实现问题是无济于事的。

当然，西斯蒙第对经济危机问题的见解是有贡献的，他的功绩在于：指出了生产过剩危机的必然性，揭露了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强调了个人消费问题对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重要作用。但他不了解生产与消费间矛盾的性质，把它看为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他错误地用消费不足作为危机的根源。不错，生产归根到底要受到消费的制约，然而危机的根源不是消费不足。群众消费不足是一切剥削制度社会里所共有的现象，在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里都存在群众消费不足的事实，却没有发生过生产过剩危机；危机是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并且，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表明，正是经济危机爆发以前的时期，工人的消费有所增加。另一方面，从危机过渡到萧条、复苏，也根本不是由于工人消费增加的结果。照例危机的出路是从生产资料的销售量扩大开始的，推向复苏和高涨的动力是

固定资本的更新。因此，不是个人消费的增加决定生产的扩大，恰恰相反，是生产的扩大引起个人消费的增长。

西斯蒙第把生产和消费间的矛盾看为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由此把资本主义看为是历史的过渡形态，但他只是从分配关系中看到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质。他还不了解分配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一种形式，一定的分配形式以生产条件的一定社会特点和生产代理人的一定社会关系为前提；工资以雇佣劳动为前提，利润以资本为前提。这种只是历史地看分配关系而不是历史地看生产关系的观点，从一方面来说，只是一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最初的、还是软弱的（不彻底的）批判。从另一方面来说，它是把社会生产过程和简单劳动过程（这种过程就是假设没有任何社会帮助的孤立的人也要完成的）混而为一的结果。

马克思写道：“资产阶级的生产，由于它本身的内在规律，一方面不得不这样发展生产力，就好象它不是在一个有限的社会基础上的生产，另一方面它又毕竟只能在这种局限性的范围内发展生产力，——这种情况是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是资产阶级生产中种种尖锐矛盾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资产阶级的生产就是在这些矛盾中运动，这些矛盾，即使粗略地看，也表明资产阶级生产只是历史的过渡形式。”

“其次，这一点被例如西斯蒙第粗浅地但又相当正确地看成是为生产的生产同因此而排除了生产率的绝对发展的分配之间的矛盾。”^①

（四）

西斯蒙第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毫不犹豫地指责资本主义的

^①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三册，第86—87页。

发展，揭露資本主义的矛盾和缺陷，抨击資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資本主义說成是合理的自然制度。他指出了机器生产和分工的破坏作用，資本和地产的集中，生产过剩危机，小資产者和小农的必然沒落，无产阶级的貧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財富分配的极不平等，各民族之間的毁灭性的工业战争，以及旧道德、旧家庭和旧民族性的解体等。他譴責資本主义是为了手段而牺牲目的，声称資本主义虽然促进了国家財富的增加从物质进步來說确实是令人惊奇的，但它并沒有給穷人带来任何好处，工人完全成了无产者，失业和貧困使他陷入无以复加的困难状态，以致由于饥饿而奄奄待毙。他还駁斥了那种认为最自由的竞争，决定着工业的最有利的发展的說法，指責資本主义是弱肉强食的社会。

西斯蒙第断言，交換的迅速发展敗坏着人民的良好的風俗习惯。經常想多賺些錢，就一定会使卖者抬高价格，进行欺骗；靠經濟交換为生的人的处境愈困难，他就愈受到欺骗活动的誘惑。他声称，商业活动在經濟制度中只是次要的，首先必須增加提供生产資料的土地財富。以商业为生的阶级只有在土地产品存在的时候，才應該获得这种产品的一部分；它只有在这种产品增多的条件下才應該增长。因此，他在《新原理》中以很多篇幅埋怨工商业的增长超过农业的发展。

他指責政府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是不合理的，是一种人工培植資本主义的做法，这种做法使国家受到損失，因为政府是靠牺牲本国人民来貼补本国的商人。他还认为，在英国实行的农場的高度集中也是地主不顾国家利益所造成的。他說：人們“……在頌揚这些精耕細作的农田时，應該看到耕种它們的居民；他們比法国耕种

同样大小的田地的居民要少一半。……这部分非常稀少的农业人口，同时还非常穷困。”（本书第 150 頁）

在西斯蒙第看来，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是人們、特別是执政者遵循了錯誤的學說和政策的結果。他把资本主义的矛盾看为是反常的或錯誤的偏向，用消除它們的格言、規範等等来反对这些偏向，不懂得这些矛盾是反映资本主义社会中占一定地位的阶级的現實利益的，把利益的矛盾当做學說、政策、措施等等的矛盾或錯誤。他特別把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作为典型，作为其他国家的前車之鉴。他指出：“英國的例子格外令人注目，因为它是一个自由的、文明的、管理得很好的国家，它的一切灾难的产生只是由于它遵循了錯誤的經濟方針。”（本书第 9 頁）

西斯蒙第以为只要人們、特別是执政者認識到这种錯誤，并着手糾正这种錯誤，采取正确的、也就是他所闡明的學說和政策，就能够使人民获得幸福的生活。他把自己改革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国家政权和执政者的身上，要求“政府保护居民擺脫競爭的后果”，呼吁国家調節經濟生活。他說：“立法者还必須使穷人得到某种不受普遍競爭影响的保障”。（本书第 61 頁）又說：“当財富逐漸地均衡地增加时，当它的任何部分都不是过分迅速地发展时，这种增加才能造成普遍的福利，……也許政府的職責就是延緩这种运动，調節这种运动。”（本书第 244 頁）

西斯蒙第希望消除人們之間的对立状态，但他反对消灭私有制，反对以社会主义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合作的名义倡議建立一个嶄新的社会制度，企图利用为完成社会所需要的一切工作而組成的集团的利益来代替个人利

益，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他写道：“一般說来，完美的社会制度对穷人和富人同样有利，政治經濟學教导我們通过改进的办法来保留这种制度，而不是推翻它。……立法者决不是用平分財产的方法来使人获得幸福，因为这样可能破坏唯一能創造一切財产的劳动的热情，而且劳动只在这种不平均的情况下才能受到鼓舞，劳动热情才能通过劳动而不断恢复。”（本书第 23 頁）

宗法式农业和行会式工业組織是西斯蒙第的理想，但他并不是想完全恢复到中世紀状态去，他沒有提出过这个任务。西斯蒙第所要求的是经济发展應該采取宗法制和行会的原则；他把中世紀的联盟当作規范应用到資本主义社会，用这种原則和規范来要求資本主义社会。

西斯蒙第希望把城市中的企业和农村中的农場分散成为数众多的作坊，把財产分給为数众多的中等資本家。他說：“必須消灭的不是貧苦阶级，而是短工阶级；應該使他們回到私有者阶级那里去。”（本书第 445—446 頁）他的願望的全部实质就在于“回到”私有者阶级那里去。他写道：“只有当人們能够設法建立一个彼此关心的集体，来代替工业企业家和被他們雇佣者彼此对立的制度，使农业工人分享土地收入，使产业工人分享自己产品的时候，……产业阶级才能幸福，才有实际而持久的繁荣进步。”（本书第 446 頁）在西斯蒙第看来，只有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生产和消費、財富和人口才能按正确的比例齐步前进。

西斯蒙第希望劳动群众摆脱貧困和苦难的遭遇，过愉快和幸福的生活，这种願望是好的。他意識到資本主义的矛盾，这也是他比那些持盲目乐观主义、否认这些矛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高明

的地方。然而，他在抛弃盲目乐观主义的同时，把自由竞争发展了社会生产力这一点也否认了。他不相信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懂得资本主义促进了生产力的增长，否认这种增长的可能性，认为不均衡的发展不是发展。他不了解大机器工业对西欧各国旧的宗法式的社会关系所实行的“破坏”具有进步的意义。他从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首先并且主要的是希望、请求、呼吁和要求“停止破坏”。

《共产党宣言》在讲到以西斯蒙第为代表的早期的小资产阶级批判家时写道：他们“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①说他们是反动的，因为他们企图以旧的宗法式的尺度来衡量新的资本主义社会，想在旧秩序和旧传统中寻找规范，而这种旧秩序和旧传统完全不适合于已经变化了的经济条件；说他们是空想的，因为他们希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保存那种为小生产所特有的“正确比例”，而这种“正确比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格格不入并且必然被破坏，他们所向往的小商品生产也正是资本主义滋生的基地。

(五)

由此可见，西斯蒙第的功绩在于指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正是他胜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地方，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即使是斯密和李嘉图那样杰出的资产阶级科学家也不承认资本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

的矛盾，同时必须指出，西斯蒙第并没有、也不想去分析这种矛盾，只是以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代替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

《新原理》的总的精神是企图证明：工农业中的大企业经济和雇佣劳动的发展，使生产必然超过消费，从而面临着寻找消费者这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它在国内不能找到消费者，因为它把大量居民变成短工和普通工人，造成失业人口；要寻找国外市场，则因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登上世界舞台而日益困难。在西斯蒙第看来，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是错误的。他不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满着矛盾，这并不妨碍它的存在，也不妨碍它作为一定的经济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正是在不断的矛盾中发展，最终地为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

当然，我们决不能因为西斯蒙第没有进行科学的分析而责备他。《新原理》是一百多年以前写的东西，那时西斯蒙第所看到的是当时十分新颖的现象的第一步。他的幼稚还情有可原，就是和他同时代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也还相当幼稚地认为这些新现象是人类的永恒理性的产物。列宁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①

因此，我们要责备的不是西斯蒙第，也不是他的粗浅的伤感主义的观点，而是那些不了解这种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区别的人，也就是十九世纪末的俄国民粹主义分子布·艾弗鲁西之流和现代的西斯蒙第主义者。

^① 《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50页。

目 录

第二版序	5
第一版序	15
第一篇 政治經濟学的对象及其起源	19
第一章 政治学的双重目的	19
第二章 政治学的分类。高級政治学和政治經濟学	21
第三章 管理国民財富的理論成为一門科学对象以前的 国民財富的管理	24
第四章 十六世紀查理五世的大臣在政治經濟学中实行 的第一次革命	30
第五章 重商学說	32
第六章 重农学說或经济学家的学說	37
第七章 亞当·斯密学說。本书的其他部分	43
第二篇 論財富的形成和发展	49
第一章 单个人的財富的形成	49
第二章 財富通过交換在社会中的形成	53
第三章 論社会人的需要的增长和生产的极限	57
第四章 收入怎样从資本中产生	62
第五章 国民收入在各个公民阶级間的分配	73
第六章 生产和消費的相互决定以及支出和收入的相互决定	79
第七章 貨币怎样簡化財富的交換	88
第八章 商业如何促进生产并替換生产資本	90
第九章 不能在自己的产品中获得劳动价值的劳动阶级	94

第三篇 論領土財富	100
第一章　關於領土財富的立法目的	100
第二章　政府对于耕作方法的进步的影响	103
第三章　論宗法式的土地經營	108
第四章　論奴隶制的經營	115
第五章　論对分制的經營或平分收获制的經營	121
第六章　論勞役制的經營	130
第七章　論通过人头税的經營	135
第八章　論出租制的經營	138
第九章　論长期出租制的經營	152
第十章　論谷物貿易法	155
第十一章　論土地所有权的出卖	166
第十二章　論貴族家庭永远保持土地所有权法	171
第十三章　李嘉图先生的地租論	183
第四篇 論商业財富	192
第一章　商业体系中的国家繁荣	192
第二章　論关于市場的知識	198
第三章　卖者怎样扩大他的市場	205
第四章　商业財富怎样隨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	214
第五章　論工資	223
第六章　論利率	232
第七章　論劳动分工和机器	235
第八章　論廉价生产競爭的結果	240
第九章　論政府規定的专卖权	246
第十章　論法律对生产者增加的限制	252
第十一章　論关税	259

第十二章 政府对商业財富的影响	267
第三篇第十章第 159 頁補遺.....	274
第五篇 論貨幣	277
第一 章 貨幣——价值的标志、抵押和标准	277
第二 章 論財富与貨幣之間的比例	279
第三 章 貨幣和資本的基本區別	284
第四 章 利息是資本的收益，不是金錢的收益	294
第五 章 論貨幣鑄造	300
第六 章 論票据	311
第七 章 論銀行	315
第八 章 信貸決不創造它所支配的財富	325
第九 章 論銀行券变成紙币的危險	339
第十 章 論紙币	352
第六篇 論賦稅	359
第一 章 誰應該納稅	359
第二 章 賦稅怎样触及收入	363
第三 章 論与收入相应的单一稅制	368
第四 章 論土地稅	374
第五 章 論其他收入的直接稅	383
第六 章 消費稅	388
第七 章 公債	398
第七篇 論人口	414
第一 章 人口的自然发展	414
第二 章 收入怎样限制人口	418
第三 章 限制人口增加的決不是土地所能生产的生活資料	424
第四 章 国家希望人口怎样增加	431

第五章 宗教对增加人口的鼓励	437
第六章 政治对增加人口的鼓励	441
第七章 論机器的发明造成人口过剩	447
第八章 政府應該怎样保护居民不受竞争的影响	460
第九章 工人有分享雇主所享有的保障的权利	466
对消費和生产的平衡的說明	479
第一篇論文 关于李嘉图先生的一个学生在《爱丁堡評論》 上发表的《駁政治經濟学新原理》的探討	481
第二篇論文 論消費与生产的平衡	500
第三篇論文 关于薩伊先生的《消費与生产的平衡》 一文的几点意見	528
譯名对照表	532

第二版序

再版的这部书，今天已經发表七年了。勿庸諱言，它並沒有得到現在被真正公认为促使政治經濟学有重大进展的学者們的稱許；不过，他們在攻击我这部书时笔下留情，我不能不表示感激。我沒有引起讀者很大的兴趣，这一点我并不惊奇；因为我对于公认为定論的原理表示怀疑；我推翻了一种科学，它好像是以其單純、以其法則的明确和整然的推理而成为人类智慧最寶貴的創造物；最后，我攻击了一种在哲学中正如在宗教中同样有害的正統学。同时，我还有一个极为不利的条件；我脫离了政見相同的朋友；我指出他們提出新措施的危險性；我闡明了他們长期以来被当作時弊加以攻击的許多制度却得到了良好的結果；最后，我再一次請求社会力量的干涉，以便使財富的进步正常化，而不使政治經濟学遵循一个最简单的、在表面上好像最自由的所謂“自由放任和自由競爭”(*laisser faire et laisser passer*)的方針。

我並沒有任何不滿的地方；我在等待着，因为真理比學說更有力量。如果我搞錯了，今后的事实一定会证明这一点；如果与此相反，我不但發現了新原理，而且依我看来，它們正开始受到重視，事实也一定会馬上出来支持，到那时候，我虽然尊重科学家們的权威，也要像伽利略一样大胆地說：“它明明在动呀 (Eppur si)